



刘鉴乐全家福

## 脞论词的起源

刘鉴乐

### 前言

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我们知道诗歌方面的成就，到了唐朝实已臻于登峰造极的阶段；一方面由于这个时代出了几位显赫一时的大诗人，如李白，杜甫，白居易等。同时又有帝王的提倡，如唐玄宗，他就是一位爱赋诗的天子，在这种所谓上有所好，下必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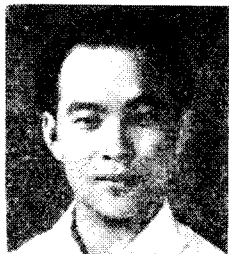
甚焉的情况下，可想而知，势必风靡一时，于是，继初唐四杰之后，诗人骚客辈出，真是一时如雨后春笋。

公元八世纪上半期，由于人民安居乐业，许多诗人，都以他们美满的生活内容，和天赋的热烈感情，以美丽的翰藻，写出许多和谐悦耳的诗歌。迨至盛唐之际，写诗的范畴又寝渐扩大了，遑论边疆风情，塞外凤凰，征人离妇的别恨哀情，皆尽入诗歌的风什。

进至中唐的时候，诗歌的发展可以说已经达到饱和点了；就从文学演进的原则来看，凡是一种文体当它达到巅峰的阶段时，往往就会有另一种新的体裁脱颖而出，这种新的体裁的产生，是当旧文体演进到极盛之时期，就潜伏有新文体的萌茁了，这是由于历史环境各方面的关系，才有另一种体裁之产生。至于词也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以新生的姿态出现，继承了诗的地位。

词是盛行于宋朝，它的形式与古诗抑或近体诗，均有迥然不同之处，在格律上来说，诗比较宽些，而词则颇严格，它不仅讲究平仄，同时还须注意文字的四声，它的意境比诗深得多，而且含蓄，委婉，轻松，活泼，

词就是具备有这些长处的一种新颖之诗体。昔人多以为词就是说文上所指的意内而言外之词。这个见解是舛误的。其实这种新诗之词是当时人称之为曲子词的“词”。我们可看孙光宪著的北梦琐言，其文曰：



“晋相和凝，少时好为曲子词，布于汴洛，泊入相，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。”

我们知道孙氏乃唐朝人，而词之起源又是在中唐，以当时人之话，去了解当时的作品，该是最正确的途径。

### 词的起源

近人对于词之发轫问题，说者纷纭，莫衷一是，这是由于各学者之稽考方式及见地之有异，于是遂有各树一帜之现象。

现代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，他曾著文谓词之起源云：“长短句的词，起源于中唐，至早不得过西历八世纪的晚年。”（见胡适文存）这个说法，我们知道胡先生是以历史家的眼光去下判断的。

关于词的起源问题，归纳过去和现代的一般学者所主张者，不外下列六种说法：

(A)词起源于长短句说——在清朝朱彝尊所编的词综汪森序里有云：“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，南风之操，五子之歌，是已。周之颂三十一篇，长短句居十八，汉郊祀歌十九篇，长短者居其五，至短箫铙歌十八篇，每篇皆长短句，谓非词之源乎？”谈到这里，首先我们要明瞭的就是长短句之词是如何形成的？必须加以彻底洞悉。朱子语类中有一段述及朱熹对长短句之来源，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古乐府只是诗中泛声，后人怕失却那泛声，逐一声添一个实字，遂成长短句，今曲子便

是。”这种说法，未必可靠，原因是我们从表面来看，诗和词显然是两种诗体，诗是整齐的五言抑七言，而词却是长短参差的。

郑振铎先生，他曾经说过词和诗并不是子母之关系。在唐代，凡是可歌的新声，均以“词”称之，当初之际，可能写这种新声之作者，亦想依五七言之句法，惟由于固定之句法，无法控御一切的新声，在穷则变，变则通之原则下，所以，长短句便遽然而起。

(B)词起源于诗馀说——主张此说者有宋翔凤，他说：“谓之诗馀者，以词起于唐人绝句，如太白之清平调，即以被之乐府，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词之变格，为小令之权舆，旗亭画壁诸唱，皆七言绝句，后至十国诗，遂竟为长短句，自一字两字至七字，以抑扬高下其声，而乐府之体一变，则词实诗之馀，遂名曰诗馀。”（乐府馀论）宋氏说清平调乃词，而是已经被诸管弦者，我们从全唐诗中可翻出李白所作之清平调，它却是一首绝诗，合乎绝诗规则的一首诗，而被配上音乐后，就称之为词，可见这是指歌词之“词”。

徐钜认为词之起源与三百篇有关，他在其著作词苑丛谈里有提及，他引药园闲话说过的话；诗经中之三五言调，二四言调抑六七言调以及换韵调，换头调，这些调中都是烦促相宣，长短互用，以启迪后人协律之原。

汪森在词综序云：“自古诗变而为近体，而五七绝句，传于伶官；乐部无所依，不得不变为词。”由汪氏之说看来，似乎词与乐府有关。

由于当时的风人抑文人频喜把诗繁衍为词的，例如古诗云：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”叔原却把它衍成“今宵剩作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由这例看来，词又像是从诗繁衍而来的。

香研居词尘的作者方成培，尝说：“自五言变为近体，乐府之学几绝，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，必杂以散声，然后可被之管弦，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，此自然之理也，后来遂谱其散声，以字句实之，而长短句兴焉，故词者，所以济近体之穷，而上承乐府之变。”方氏这段话的大意是说：长短句式的词是当近体诗臻于穷途之际的一种应运而生的新诗体，而它与乐府是有血缘之关系，既然与乐府有相因，那么我们再看它们之关系。

(C)词起源于乐府说——徐钜词苑丛谈里也有提及，其文曰：“填词原本乐府，菩萨蛮以前，追而溯之，梁武帝江南弄，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，前之言详矣！”我们试想一下为什么徐钜会说词之源头与乐府有关呢？这可能是由于古乐府乃一种可唱之歌词，从形式上看已与小词近似，故徐氏才会有此说。我们再看宋朝王应麟，他的见解与徐钜雷同，他在困学纪闻里说：“古乐府者，诗之旁行也。词曲者，古乐府之末造也。”

徐巨源曰：“乐府变为吴趋，趋艳，杂以捉搦，企喻，子夜之属，以下逮于词，而乐府亦衰。然子夜懊侬善言情者也，唐人小令留得其意，则诗馀之作不谓之直接于古乐府不可。”徐氏也说古乐府逮至于词兴起后即

趋于末路了，也是说词的突起而递送了古乐府的地位。徐氏又提及小令，这文体原是一种长短句，唐人对于那些五十八字以内之词调，称之为小令。我们从中原音韵知道小令与乐府是两途者，乐府语可入小令中，而小令语却不能入乐府。

(D)词起源于音乐说——主张这派之人，亦实繁有徒；成肇馨唐五代词选序云：“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，乐府微而歌词作，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。抑扬抗队之音，短修之节，运转于不自己，以蕲适歌者之吻；而终乃上跻于雅颂，下衍为文章之流别。诗馀名词，盖非其朔也，唐人之诗未能胥被弦管，而词无不可歌者。”

成肇馨之主张，词乃继承国风之衰颓后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声，这种新创文体，不啻可诵同时亦可歌；成氏已否定词之溯源为雅颂矣！

俞彦说：“六朝至唐，乐府不胜诘曲，而近体出。五代至宋，诗又不胜古板，而诗馀出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甫脱颖而传遍歌者之口。”

按俞氏之说，乃谓词之由来，是由于古乐府沦为诘曲后，当时就有人作近体诗以资挹注，詎料这种诗囿于刻板字数，过于形式化，不能尽情发泄个人胸臆中之郁结及缠绵之情绪，于是为了拯救这个危机，便有新文体应运而生，这是出乎时势所使然的，中国人最喜欢在穷困之际，就运用穷则变，变则通的原则，一切的文体在这种条件的具备下，就脱颖而出；昔的学者对于这位半

途杀出的程咬金——词，大家都猜疑其来历，于是议论纷纭，无法定规。

(E)词起源于近体说——主张此说者亦不乏其人，现举梦溪笔谈所载：“诗之外又有和声，则所谓曲也，古乐府皆有声有词，连属书之，如曰：贺贺贺，何何何之类，皆和声也。今管弦之中，缠声亦其遗法也。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，不复用和声。”

除此之外，全唐诗附录曰：“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，其并和声歌作实字，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。”

我们看上述两种见解，已道及乐府沦为末流之际，遂运用填实字的方法来弥补其阙如，亦即长短句之起源；所谓缠声就是指音乐中之余音。全唐诗附录中所道及之填词者，就是指词的来源，乃由于填实泛声，因是故原为外表整齐，字数有定，格律有限，平仄有规之五七言近体诗，一跃而突出他种新颖的文体。

胡仔在他的著作苕溪渔隐丛话里亦谓：“唐初歌词，多为五七言诗，初无长短句；自中叶以后至五代，渐变成长短句，及本朝则尽为此体。今所存者止瑞鹧鸪，小秦王二阙，并七言绝句而已。瑞鹧鸪犹依字可歌，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，乃可歌耳。”

在唐初之际，所谓歌词是指那些近体诗能谱入曲拍中者，称之为歌词，并没有明显界线规定，我们举一例以言之，如唐诗三百首中李白的清平调：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

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

这首原是七绝的近体诗，可是被配以音乐后，却变成了歌词。再举一例，如尊前集中刘禹锡作的纥那曲：

“踏曲兴无穷，调同辞不同，愿郎千万寿，长作主人翁。”

这首遑论从何种角度去看，它的确是一首五言绝诗，然而它却是被称之为歌词的，因此从上述二例观之，可知在唐初之际，所谓歌词者，乃是指那些近体诗能被诸管弦的，就称为歌词。

(F)词起源于里巷之音及胡夷之曲说——主张这派的亦大有其人，现代学者郑振铎先生也是主张是说者，其理由是：“中国音乐是受到外来音乐之音响最深。”他并引唐书音乐志：“自周隋以来，管弦杂曲将数百曲，多用西凉乐，歌舞曲多用龟兹乐。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。”这里就是说胡夷之曲；自周隋以还，已经大量采纳外来乐章，及歌辞，迨至唐以前，此等歌辞，大部份已佚，仅存曲调而无歌辞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唯一能补救的办法只有请当时风人骚客新作歌辞，俾谱入曲中，如是者，填词之风遂蜂拥而起了。

此外郑振铎先生也赞成“里巷之音”为词起源之一因，因竹枝词，浪淘沙，调笑令，款乃曲，杨柳枝等皆为民间里巷之音，其情调也很通俗，现在随举之为讨论之例。竹枝词，其词曰：

“山桃江花满上头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似侬愁。”



浪淘沙:

“借问江潮与海水，何似君心与妾心？相恨不如潮有信，相思始觉海非深。”

调笑令:

“杨柳，杨柳，日暮白沙渡口，船头江水茫茫，商人小妇断肠，肠断，肠断，鸬鹚夜飞失伴。”

像这三阙歌词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情调完全是浑朴真挚的，一点都不雕琢。

按乐府集所载，知竹枝本出于巴渝，在唐贞元中之际，刘禹锡居沅湘，曾作竹枝九章，教里中儿歌之，并吹短笛，击鼓以赴节，凡是歌者皆扬袂睢舞。

### 总评词六种起源说

上面所引论六说，到底哪一说较为正确呢？现在笔者就以粗浅见识来逐一加以讨论之：

第一个词起源于长短句：这个说法，未可全信，原因是，词固然是长短句形式，但长短句未必尽属于词，这就是我们应特别关注之一点，我们举例以说明之，在诗经里，有长短句形式的如邶风中简兮：

“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谁之思？西方美人，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”

像这首有长短句形式的明明是诗经，而非词，故词虽然是长短句参差，惟长短句之诗未必尽是「词」。

据程大昌演繁露云：‘魏，晋，唐郊庙歌率多四字为句，唐曲在者如杨柳，竹枝，款乃，句皆七字，不知

当时唱用何为调也，张华表曰：“汉氏所用文句，长短不齐。”则今人以歌曲为长短句者，本张华所陈也。

上引程氏之说，乃可见长短句名词之来源，同时并知其所指者是只说“汉氏所用文句，长短不齐。”并未说出长短据即是词。倘若勉强要说长短句即词，则可能与俞彦同样的见解，因他说：“词的起源，溯其源流，咸自鸿蒙上古而来，如亿兆黔首，固皆神圣裔矣。”

第二个诗馀之说：这一派的主张者，以为古诗变为乐府，后来又演变为长短句，所以叫词为诗馀。引况周颐惠风词话一段云：“诗馀之说，作赢馀之余，唐人，朝成一诗，夕付管弦，往往声希节促，则加入和声，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，遂成为词，词之情文节奏，并皆有馀于诗，故曰诗馀，世俗之说，若以词为诗之剩义，则误解此馀字矣！”像这种说法，亦可说是词起源之一因素，因为词的兴起，是处于诗达到穷途之际，已经无法再悉数被诸管弦，同时即使能谱入曲中的，俟唱起来时，往往感到音节不协调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种新的文体脱颖而出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

第三个词起源于乐府之说，这说法可谓亦有是处，我们知乐府是一切诗歌之叶乐者及词曲之总称。以系统的观点来看，乐府，近体诗，词等都是直接与音乐有关的，我们看清代王世贞先生，他对中国诗歌的源流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当古乐府不入俗时，遂以唐代绝句为乐府。而绝句又因囿于格律，字数，以致不甚婉转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词就应运而生了。就乐府本身而论，也分

成旧乐府与新乐府，前者可唱，后考可颂不可唱。

王国维先生在他的著作戏剧考源中，他曾提到关于词起源的问题，其文曰：“诗馀之兴，齐梁小乐府先之。”

按王静安先生所说诗馀之兴，乃是指词的兴起：这说法与王世贞之说法同。

我们看徐巨源之说法，已经很清楚，就以乐府之形成，也是相当复杂的，若分析其源流，亦不仅一因素，而是由诗经，骚赋中解放出来；原乐府亦歌辞也，其名称来由，是汉武帝立乐府协律，后来凡是经过这机关制乐配谱者，一律称之为乐府，也是一种可唱的歌辞。

至于徐钜在词苑丛谈里说的：梁武帝之江南弄及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，这说法稍嫌过于武断，我们看江南弄：

**“众花杂色满山林，舒芳耀绿垂轻阴，连手蹀蹀舞春心，舞春心，临岁腹，中人望，独踟蹰。”**

六忆诗：“忆来时，灼灼上堦墟。勤勤叙别离，慊慊道相思。相看常不足，相见乃忘饥。”这首是六忆诗之一，此诗原为六首，今仅存四首，即忆来时，忆坐时，忆食时，忆眠时等。

从上举二首乐府诗看来，虽然它们的形式是长短其句，惟不能一口咬定它即是词之祖，因词的形式，固然是长短句的形式，但有长短句之形式者不能叫它为“词”。

再说在诗经中也有许多是有长短句式的，如小雅中

之鱼丽，召南中之殷其雷，都是长短句式的，尤其是周颂三十一篇，有长短句式者竟占了十分之八之多。由此可证明有长短句之形式者，并不一定是词，同时也说明了，江南弄与六忆诗，它们虽有长短词形式，却不能说是词之祖，倘若要牵强说，那诗经不是更有资格为词之祖吗？惟事实告诉我们，诗经与词，迥然是两种文体，所以我们可联想到江南弄与六忆诗为词之祖是不可能的。

第四个，词起源于音乐之说：这派的见地颇有精髓，因为词原是以协乐为主，有了声律之后才有填词之举，这是不庸异议的。为何我们知道词与音乐有关呢？从古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如碧鸡漫志一书，是宋朝王灼所撰，其中详载各曲调之源流，此书对词的起源也有道及，其文曰：

“唐时古意亦未全消，竹枝，浪淘沙，抛球乐，杨柳枝乃诗中绝句，而定为歌曲。……元白诸诗，亦知音者协律作歌。”

由此可见词之起源实与音乐有关。六朝至唐，乐府经七个朝代，已沦为末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近体诗就脱颖而出，递替了乐府的地位，乐府至唐朝已寝渐隐迹了。

音乐之变迁为何会引起词的产生呢？这是由于唐朝的人，对于古乐府，只有存声，不存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唯一的弥补办法，即是依声制词，于是，竹枝，杨柳枝就相嗣而出，继而望江南，菩萨蛮等曲也接踵而

出。

第五个，词起源于唐代近体诗说：此说亦可通，原因是在唐朝，初期的歌词，有些是用近体诗而能被诸管弦者，同时也杂以和声唱之，后来又把这和声填以实字，长短其句，这样唱起来，可以使声音增柔曼。

不过初期的歌词，有整齐的如五言或七言绝诗，因歌词在萌茁之时期，是与近体诗分辨不出的，这是指从表面观察，唯一我们能知的就是近体诗被诸管弦后，即成为“歌词”，如李白的清平调，刘禹锡的纥那曲，这都是由近体诗摇身一变而成歌词的，然而穷究其源，歌词是由近体脱胎而出的。故此，词起源于近体诗，亦可信为其旁系之一因素。

第六个，词起源于里巷之音及胡夷之曲：这点应分两方面来说：假如说词的产生是起于里巷之音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它是属于民歌，倘若就这样肯定词起于里巷之音；而诗经也是採诸民间，这一来，岂不是成了与诗经之溯源雷同吗？然而事实并不如此，诗经与词之源流是迥然不同的，也就是说，词不可能起于里巷之音。

至于说词与胡夷之曲有关，这倒还说过得去，因这是与音乐有关的。根据历史所载，知道从周隋以还，自外族输入之音乐颇多，这些乐章起了渗透作用，一时使中国的音乐混有胡夷之曲在内，这等乐章和歌辞，到了唐初期已散佚，后来，才依据原有曲调另作新辞，这也是第四个词起源于音乐说有互相关联的。

总括论述以上六说，可得一结论：词起源于音乐或

起源于近体诗两者汇合而成的源流。这里附带声明一句：笔者所说的词起源于近体诗一则，其作品是包括官家诗人及民间诗人，共同携手合作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，再加以外来音乐即所谓胡夷之曲的影响，便产生出一种新颖的，划时代的新题材——词。